

博览群书

1988·7——1

合订本

光明日报社《博览群书》编辑部编印



Bglan
Lansky 1988

7

博覽群書

《人生五大问题·论婚姻》评介

二十世纪的旋律

漫画家的幽默

推荐 《角色变迁中的男性与女性》

智力投资的美好信息

快速记录法会使你笔下生风

快速阅读法会使你目读多行 快速记忆法会使你记性增强

招 生 简 章

机关干部学习“三快”会提高工作效率，中学生、自学青年学习“三快”会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成绩。目前全国已有三十余万人参加“三快”学习。1986年国庆晚会快速记忆专家王维的表演名扬九州。前不久的沈阳“三快”表演电视报道45分钟，大家交口称赞。耳闻目睹，使人相信“三快”有规律可循，“三快”可以使你写得快、读得快、记得快。汉字快写法会使你书写速度提高一倍，而只有300多个符号的速记技术会使你每分钟记130字以上；快速阅读法会使你阅读速度成倍提高；而快速记忆法会使你记忆轻松、有趣，事半功倍。在东北科技杂志社、青年科学杂志社、北京市速记协会、河南省速记速读研究会、辽宁省速记研究会、锦州市记忆研究会有关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锦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锦州市速记学会联合举办“三快”函授。

教材：快速记录：汉字快写10万字、速记15万字、课卷2万字；快速阅读：快读方法10万字，练习材料10万字，教材吸收了外国阅读法的精华；快速记忆：人名、数字记忆法，逻辑记忆法，日、英语单词快速记忆，中学文、理科快速记忆辅导，高考（成人）文理科复习指南计60万字。

学期与学费：学期每科为4个月。快速记录函授（简称L）学费14元4角；快速阅读函授（简称D）学费15元5角；快速记忆函授（简称J）学费16元6角。“三快”一起学习（简称LDJ）学费30元；“二快”LD收费22元2角；LJ收费23元3角；DJ收费24元4角。

学习与考试：学员按作业和练习进行思考并写作业，作业可邮来批改，疑难可提出。期满后发考卷，考核学员学习情况并发给学习证明。（不承认学历，不负责安排工作）

报名方法：报名者写入学申请书一份，并交报名费1元。集体报名凭介绍信。函授部收到报名申请和报名费即发“交费通知单”和“招生简章”即日起报名常年招生。

优惠对象和办法：1.参加“三快”学习（不包括“二快”或“一快”）每人发《三快实用手册》一本，样式新颖，用途广泛（专赠学员，不另收费）2.残疾人（凭介绍信）、老山前线战士参加“三快”学习收费25元。

成才的阶梯

奋飞的羽翼

△上海市徐宏发（上海青年速记协会副秘书长）学习两年速记曾获得鸭绿江杯速记邀请赛冠军。每分钟200字；辽宁凤城县通远堡81239部队战士周明生学习4个月，每分钟记录130字，调到政治处工作；全国有十几所大学和数十所职业学校开设汉字快写或速记课。

△河南省速记速读研究会的老师在有关院校开设的快速阅读课，深受欢迎，学习以后大家都说阅读真有好法，过去一字一句地读，浪费时间，实在可惜。用快速阅读法读得快还记得扎实，其乐无穷，效果尤佳。

内蒙赤峰二中刘中辉说：学了快速记忆如虎添翼；云南江城曲水教育组王成春说记忆法使他不再翻卡片，便记得104位同志的工资、补贴数。大港六局一公司孟繁荣学习记忆法，电大考试成绩平均七十六分。

辽宁省锦州市85号信箱“三快”函授部罗虹同志收。单位集体付款可收转帐支票（最好从邮局汇款）

开户行 古塔信用社

帐号 6700075

户名 锦州市速记学会



博覽群書

月刊

一九八八年 第 7 期

总第43期

图书 评 介	婚姻：本能与法 差异与宽容 ——评介《人生五大问题·论婚姻》……………赵 勇 ④
	二十世纪的旋律——读《现代音乐的焦点》……………许共城 ⑥
	一颗永不陨落的明星——读魏巍《地球的红飘带》……………石玉山 ⑦
	面对难题和挑战——介绍《生命伦理学》……………杨纯朴 ⑬
	秋天的旋律——读《索德格朗诗选》……………木 子 ⑳
	漫话《帝王诗词名作漫话》……………杨 忠 ㉓
	对理性泯灭的忧虑——读戈尔德丁的《蝇王》有感……………谷 深 ㉔
	采采流水 蓬蓬远春——读《布赫诗文集》……………包明德 ㉕
	评《清末民初文坛轶事》……………张国瀛 ㉖
	严肃的自嘲——评《丑陋的日本人》……………晓 言 ㉗
	深沉的思考——读李小江《夏娃的探索》……………汪 琦 ㉘
	中国经济起飞之路——读《发展的主题》……………傅 强 ㉙
	《国共合作史稿》简介……………汪 琼 ㉚
序 与 跋	生趣盎然过晚年——《老年人文化知识大全》序……………臧克家 ㉛
	你了解自己的潜力吗……………张 南 ㉜
	情书非“艺文之末品”……………李知文 ㉝
自学成才	思索着走路 走着路思索——记青年诗人陈景文……………钱英球 ㉞
迷人书屋	离婚之后……………张青等译 ㉟
读书一得	漫画家的幽默——读《挤出集》……………谭宗远 ㊱
	当代文学研究的尺度问题……………林 非 ㊲
	寻找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读黄望青先生文集《他山之石》随想……………王永平 ㊳
	且说“世界1·2·3”……………贾夫育 ㊴
	阳光 风暴 高原的色块——读《亚细亚荒原》……………李洪洋 ㊵

主 办 光明日报社
编 辑 《博览群书》编辑部
出 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印 刷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市邮政局
邮 购 《博览群书》编辑部（每本邮费
0.05元）
地 址 北京市永安路106号

海外文译	怪胎的孳生——美国“同性恋”文学一瞥丁磊译 ③0 红衣女谍（之二） [美] 艾琳·格里费斯 ③4
求 疵 录	令人忧虑的辞书——评近年出版的几部逆序词典 甘于思 ⑨
新 书 推 荐	女性的崛起与男性的衰落 ——推荐《角色变迁中的男性与女性》 田 子 ②8 溥仪画传的诞生 薛书君 ①4 推荐一本妙书——读《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 高洪波 ②1 读《中国典故说粹》 成志伟 ②2 焕发青春的健美素——读《中年生活指导》 温冰子 ③9 神话和现实编织的故事——读李悦的《漠王》 周文斌 ④1 打开交往之门——介绍《交往的艺术》 赵明东 ④4
文 苑	你为该读什么书而烦恼吗 ⑩ 阅读杂感 金 娟 ⑫ 我与《徐悲鸿一生》 石廷玉 ④0 读书忆旧 吴 昊 ①7 茅盾为胡适画像 黄艾仁 ①8 寂寞之中好读书 孙洪涛 ④1
作品与作家	新感觉派与川端康成 徐胜同 贾凯力 ④2 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小说 刘桂生 王华斌 ①9
书 影	我们的嘲讽与骄傲 性格影响人际关系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②4
信 息 窗	社会学研究的新成果 李建国 ②5 韦伯的《儒教与道教》 王容芬 ③5 荐《甘肃历代名人传》 晋 夫 ③5 《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出版②5《文化生活手册》面世②7 《北京话语词汇释》出版②3《世界历史》出版②0简介《会计专业 职务知识必备——备试问题解答》①5七种淫秽读物非法出版②1 编读往来④0 首届青岛电视杯“您最喜欢的百家杂志”评选活动启事及《博览 群书》的告读者 ④7④6
封 面	刘军 摄于北京兆龙饭店

下期要目 关于书的困惑 茶馆里的书斋 倪匡和他的科幻小说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2820信箱)	本刊登记	国内统一刊号: CN 11—1091
国外代号	M785	每本定价	0.60元
国内代号	2—868	开户银行	北京市工商银行珠市口办事处 《博览群书》书刊专户461031—07

漫画家的幽默

——读《挤出集》



去年从第5期《散文世界》上读到漫画家方成为他的《挤出集》自写的征订广告。文不长，照录于下：

“拙著定名《挤出集》，说明这些文章大多是被当时情势，或被别人硬挤着写出来的。交某出版社后，只征订得印数千余册，不能开印。据说如今严肃读物的命运大体如此，因不堪命运摆布，故自写征订广告。

“为自己的作品写广告，自我吹嘘，君子所不取。

“但为了和那些‘剑侠’、‘奇案’、‘新婚之夜’一类的书争夺读者，不得不来这一手。

“《挤出集》，方成著。这本书是以漫画家的文笔写的文集。有杂文，有散文，有评论文，还配有漫画若干幅。爱好文学，爱好漫画的和对幽默讽刺艺术有兴趣的读者会喜欢看，青年甚至少年们也会喜欢看，因为内容言之有物，文字多属寓教于谐，使之有雅俗共赏之效。书价每本相当于一包较好香烟的价钱，但比香烟有益多了！

“这本书已编入人民日报出版社的‘百家丛书’，定于年内出版。”

文旁还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大鼻阔嘴的作者本人夹着一摞书正在摁人家的门铃。

眼下这本书已然到了读者手中，印了五千册，不算多也不算少，想想有的书才印一两千册，方成该以手加额，连呼“知足”了。

我把这书从头到尾读了一过儿，确实不错，“比香烟有益多了”（烟能杀人，这书里可没有半点杀人之意）。如果硬拿什么比附的话，新疆烤羊肉串有些近之。羊肉串除却肉味、盐味，还有辣椒粉的辣味，孜然的香味，这两种味混在一起妙不可言，人吃了觉着舒畅痛快。羊肉串所以“誉满全球”，多亏了这种混合味，若把孜然和辣椒粉撤了，这玩艺儿可就没什么吃头了。《挤出集》里就有这叫人舒畅痛快的味道，这便是幽默。

据说中国过去只有“滑稽”一语，没有“幽默”一词，到了林语堂才把这个词译介进来。这位散文大师还写了篇《论幽默》的长文，详论幽默的起源、幽默的精义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他指

出：“是有相当的人生观，参透道理，说话近情的人，才会写出幽默作品。”这话是很中肯的。对生活抱冷淡厌倦态度，或人生观十分肤浅的人，是决然跟幽默无缘的。“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正是事物本质的不同。故此，以画漫画为职业的方成，即使在他执笔为文的时候，也不会装正经，他也会很自然地在文章中掺进幽默的成份。

那么何谓幽默？幽默与滑稽、讽刺的关系和区别又是什么？

大凡一个人爱讲笑话，我们就说这个人幽默或有幽默感，这么一来，我们就给幽默和笑话划了等号。笑话是不是幽默呢？不完全是。方成说：“单纯的逗笑，若非以奇巧的创造性动人，一般只博一笑而已，也就是小滑稽。”“滑稽和幽默都逗笑，但有区别。”“依我看，滑稽嘛，哪儿都会有，看得见，听得着。幽默，那是想出来的，平时见不着，然而，两者之间却很有关。”关系何在？方成说：“以滑稽方式发言，有言外之意，有内在的含蓄，才能引人思索。内涵越深，余味越浓，这就不是普通逗人一笑的小滑稽可比了。幽默之所以有美感，就在回味上。”这席话告诉我们，一般的逗笑可算得小滑稽，而幽默乃是“高级滑稽”、“有情滑稽”，是睿智的头脑经过体验迸发出来的机警隽永的火花，不是单纯的耍贫嘴和无聊的噱头可比的。再看幽默和讽刺的关系。方成说：“幽默是风趣地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方式。讽刺可说是带刺的幽默，是以幽默方式来进行批评和指责。”这是用很简约的话道出了两者的区别。

婚姻：本能与法 差异与宽容

——评介《人生五大问题·论婚姻》

在安德烈·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一书中的《论婚姻》一节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我们能发现相似的思想。莫罗阿说：“凡是想统治人类的人，无论是谁，必得把简单本能这大概念时时放在心上，它是社会的有力的调节器，最新的世界，必须建筑于饥饿、愿欲、母爱等等上面，方能期以巩固。”恩格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很明显，二者都阐述了人的本能需求的作用，但两者探讨这个问题的角度已经显出分别：恩格斯的着眼点在社会、历史，而莫罗阿的着眼点则在具体的每个人的对待事物的态度上。莫罗阿所要说明的是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应该怎么办，即方法的问题；而恩格斯则对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历史发展给以科学的分析；从而发现其中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是社会性的规律。因此，我认为

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以使我们从接近于哲学的高度去发现家庭的规律，而读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则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如何对待身边的事情。

在这里，我想着重介绍并简评《论婚姻》一节。

关于本能，莫罗阿说“生存本能，使一切人类利用他人来保障自己的舒适与安全，故要驯服这天然的自私性格，必得要一种和它相等而相反的力量”。而婚姻即是一种这样的力量，因为婚姻是“系着于一种本能的制度”，是“在那么容易更换对象的性本能上面”的“一种持久的社会细胞”。可见作者的把握是有分寸的，他看到了本能的力量，所以他说一切统治都必须建立在人的简单本能的基础上，言外之意是，如果根本地否定了人的本能，那么什么也谈不上（这道理是很简单的，本能之所以为本能，就在于它的不可否定性，否定了本能，等于否定了人本身，人亦不能成为人）。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个事实：“数千年来，经过了多少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骚乱剧变，婚姻依旧存在，它演化了，可没

顺便翻翻鲁迅的杂文集，以先生对幽默、滑稽、讽刺的论述证之方成，相去不远。再以方成的论点衡量他这本书，讽刺很少，幽默居多（有几篇既无讽刺也不幽默的，如怀念亡妻、漫画家陈今言的，怀念已故漫画家叶学潜的，盖心情沉重，幽默不起来）。这幽默不是密集型的，而是散点式的，保不其哪就冒出这么三五句、一两段，让你忍俊不禁，觉着妙趣横生。

还是拈出几个例子吧。《从臭虫扯出的话题》讲作者在某招待所一宿捉了四个臭虫，清早对服务员说：“你们这地方东西真贵。”服务员说：“不贵呀。”作者说：“怎么不贵？昨天晚上，我花8元钱，捉了四个臭虫，合两元一个呢！”服务员一听乐了，连忙道歉。这样幽默一下，提了意见，又显得策略，效果多好。换个不懂幽默的，直统统把话杵出去，不吵起来才怪。

《从胃说开去》开头：“这算不算一条规律呢：人到一定年龄，饭越吃越少，药越吃越多！”短短两句，藏着多少生活经验。还是这篇，讲骑自行车的好处：“一是不须候车，说走就走，说停就停，路线全由自己决定；二是不挤，上车就有座位；三是时间有保证，没有误点之说；四是空气阳光充足，于卫生有利……”全是实话，可又不是谁都说的出来的。

也有通篇幽默的，《知易行难话健身》便

是。中间一大片话简直就是精采的对口相声，摘抄几节：“你怎么没有白发？”“白的都掉了。”“染过发吗？”“不敢，怕人说我想打什么主意。”“‘血压多少？’‘200。’‘这么高？’‘高压120，低压80，加起来200，不算高。’”“‘胃口怎样？’‘人吃啥我吃啥，咬得动就吃得下。’‘有不爱吃的吗？’‘有。’‘不爱吃什么？’‘药。’”

此书四十几篇文章，题材比较广泛，出差感受、出访见闻、评论杂感、人物勾勒、往事回忆，无所不包。虽不敢说篇篇都是佳作，却篇篇可读。正如书名所示，这些文章都是挤出来的。我们都有挤牙膏的经验，袋里有牙膏才挤得出来，若牙膏袋空了，那是任你使多大劲也挤不出牙膏来的。除却幽默，言之有物恐怕是这本书可读的另一原因了。

临末再回到本文开头引录的那则征订广告上来。毫无疑问，这则征订广告也是幽默的，幽默得有点让人寒心。严肃读物的命运不济很有几年了，近年又加上了纸张涨价、出版社怕赔钱、读者购买力发生危机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做为读者，我期待有关方面尽快做出反应，尽快寻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我对这些问题的圆满解决寄予厚望。

有消灭。”这样就否定了那些因为婚姻不能美满而反对婚姻的人的论点。反对婚姻的中心论据是：“此种制度之目的，在于把本性易于消灭的情绪加以固定。固然，肉体的爱是和饥渴同样的天然本能，但爱之持久性并非本能。”莫罗阿认为这种对婚姻的攻击是“并非无力的”，但他同时指出，婚姻是“几千年来，好歹使人类不至堕入疯狂与混乱状态的几种制度”之一，这同他认为婚姻是解决“在每个结合中老是存在”的“使婚姻变得难于忍受的许多难题（争执、嫉妒、趣味的变异）”的办法的观点相一致。他作出这样的结论——不能“漫无节制的放纵”，“更新换旧的结合”、“自由的婚姻”、“‘伴侣式’结合”也都不是办法。实际上，似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在有些国家中加以离婚的调剂，在有些国家中由于不贞的调剂，在我们西方社会中，成为对于大多数人不幸事件发生最少的解决法。在这里，作者没有直接说出本能与意志（表现为作为“系着于本能的一种制度”的婚姻）之间的关系，但给我们开辟了思考的余地。完全听凭本能，放纵本能无疑是要不得的，而正象作者已经表述过的那样，无视本能也是要不得的。那么，本能与意志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合作呢？莫罗阿的结论是一夫一妻的婚姻，这也与恩格斯的论断相同：“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今日只是对妇女才完全有效，——那末，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制。”这里我们又有了一个新发现，即性爱本能也有两方面，即莫罗阿引用的“对象的易变性”与恩格斯所说的“排他性”，这两者在一定情况下就是相矛盾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本性与意志之间存在着冲突了，因为本能本身就是矛盾的。这种冲突的产物就是婚姻，它既满足了人的性爱的需要，同时又满足了社会的要求。实际上，什么是真正的婚姻的幸福呢？这个世界能否给我们以我们所幻想的那种幸福呢？当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上边的矛盾就容易解决了。人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他存在于环境之中，而环境总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的本能，却不能以其本能为转移，任凭本能去索求。事实上我们所感到的本能的欲望中又有一些对于自然本身来说是非分的幻想，因为本能是不可否定的，而并非由本能产生的一切欲望都是不可否定的，所以人这个主体要获得幸福，就不仅要解放他自己的本性，同时还要与环境达成合作。如果是“漫无节制的放纵”，必然遭到环境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就可以破坏掉人所追求的幸福。所以只有本能与意志的结合，才能产生幸福。莫罗阿引用美国哲学家桑塔耶那的话，说明本能与意志的结合：“爱情并不如它本身所想象的那么苛求，十分之九的爱情是由爱人自己造成的，十分之一才靠那被爱的对象。”作者自己也说：“一件婚姻的成功，其主要条件是，在订婚期内，必须有真诚的意志，以缔结永恒的夫妇。”这种说法未免有偏颇之处，而作者自己也看到“事实上，大战以来，如巴尔扎克辈及其以后的二代所熟知的‘安排就的’婚姻，在法国渐趋消灭以让自由婚姻之势，这是和别国相同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种偏颇的论点中可以吸取的有益之处是对于“真诚的意志”的强调。诚然，被恩格斯称为，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那种“安排就的”婚姻是需要“意志”的，而莫罗阿讲的正在取代“安排就的”婚

姻的“自由婚姻”不也需要“真诚的意志吗？”

对婚姻的探讨至此还没有停止，莫罗阿又换了一个方向，指出：共同生活的困难“主要原因是两性之间在思想上在生活方式上天然冲突的”，这是十分中肯的思想。而且他发现“什么也消灭不了性格上的深刻的歧异，即是最长久最美满的婚姻也不可能。这些异点可被接受，甚至可被爱，但始终存在”。那么这些差异是什么呢？莫罗阿认为“男人发明主义与理论，爱构造种种制度，想象实际所没有的世界，在思想上改造世界”。女子“不爱抽象观念”，“女子的天性欣向着性爱与母爱；男子的天性，专注于外界”。这种看法我想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是否完整地而且深刻地说明了男女之间的差异还无法判定，这方面的问题还未成为系统研究的领域。但是，发现男女之间的冲突的意义，已经给我们很大启发。正如异性相吸是一条规律，同构相容也是一条规律。而且，我继而就可以看到男女差异的合理性，因为假如男人与女人没有这些差异，那么男人亦不成为男人，女人亦不成为女人。解决冲突的办法也不可能是消灭差别。于是莫罗阿说：“一个纯粹的男子，最需要一个纯粹的女子去补充他”，“两性之间没有对于异点的互相接受，对于不同的天性的互相尊重，也便没有真正的两性合作”。的确，要合作，合作意味着以满足为目的而以宽容为途径。实际上，哪里不需要合作呢——既然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有能力对他周围的一切发号施令，所以，莫罗阿又说：“婚姻本身（除了少数幸运或不幸的例外）是无所谓好坏的。成败全在于你。”婚姻存在到今天这个事实，就证明了婚姻本身的确没有好坏。此外，作者又加一层，几乎是完美地回答了关于婚姻的疑难：“婚姻不但是待你去做，且应继续不断把它重造的一件事”，因为“人间没有一样东西能在遗忘弃置中久存的”。

现在再回来看看作者对于男女差异的思考，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探索。在我们日常习惯了的许多现象中，存在着最为深奥的又最为本质的东西。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到它，却又不能把它说清，所以在我们能解释这些现象之前，可以说我们完全处于盲目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产生了许多难以做出完满解答的问题。男女差异到底是什么情形？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做比较系统的研究将会有很大的益处，至少它可以使我们对于婚姻问题的理解深入一大步。而莫罗阿的这种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可取之处。

婚姻是什么？人生是怎么回事？尽管其中存在一些不明确、未能深入以及失之偏颇的地方，《论婚姻》以及《人生五大问题》都是值得一读的。

（《人生五大问题》，三联书店出版）



对18、19世纪的音乐大师，如音乐之父巴赫、缪斯之子莫扎特、钢琴诗人肖邦等，我国的广大音乐爱好者是比较熟悉的，相比之下，对20世纪的音乐大师，多数的音乐爱好者则是比较陌生的。我国台湾作曲家潘皇龙先生的《现代音乐的焦点》对于我们了解20世纪的音乐大师及其代表作品是一本极好的入门书。作者于书中所述的内容，非止闭门研究的心得，他旅欧八载，多次参加世界各大音乐节，如西德的国际达姆斯大新音乐夏令营、波兰的“华沙之秋”以及国际新音乐协会年度作品发表会等等，他在这些大音乐节中发表作品，与当代作曲大师交流并获得他们的指点。《现代音乐的焦点》是他于各大音乐节庆中观察、体验和多年研究的结果，书中所述，都是些“焦点”性的内容，向读者演示了20世纪的旋律。

被作者选为“现代音乐的焦点”的音乐家是以下七位：荀贝格、贝尔格、魏本、史特拉汶斯基、史托可豪森、李给替和拉亨曼。

这几位音乐大师都有新的创造和巨大的影响。荀贝格舍弃传统的多乐章形式，创立了多元性单乐章形式，为音乐的形式世界开创了新的纪元，他还发明了“十二音列作曲法”。贝尔格在他的乐曲中运用精细的噪音结构，把噪音作为音乐创作的素材，这启发了现代众多作曲家追求乐音与噪音并用的潮流；他将传统与现代、复音音乐与主音音乐融合为一，既能“曲高”又能“和众”。80年代现代音乐渐趋复古，或许是由于他的启示。魏本首创了“格言主义”的音乐语法，他尝试着把各种不同的素材“镶嵌”起来，通过“组合”给人以美感。他的“格言主义”音乐小品被“点描音乐”的作曲家和运用“组合形式”的作曲家们奉为经典作品；他把小宇宙与大宇宙的观念运用于音乐的结构上，启示了尔后“多重层次、多重意义”的音乐形式。史特拉汶斯基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芭蕾舞曲，奠定了芭蕾舞发展史上音乐部门的绝高地位。他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提高了“节奏”在音乐创作中的地位，把“原始的”变成“现代的”。他把欧洲传统音乐文化介绍到美洲，是美洲音乐文化的开拓者之一。史托可豪森是战后乐坛最重要的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他是“系列音乐”的代表者之一。他独创性地运用“点描形式”、“组合形式”和“瞬息形式”进行创作。他受禅学思想的启示，将亚洲人的哲理融于音乐创作中，竭力倡导音乐的国际化。李给替的“色泽音响”是继巴哈、贝多芬、荀贝格以来“色泽音响”的典范，也是系列音乐的回响；他的“微分复音音乐”的语法使复音音乐发展到一个更高境界。拉亨曼大胆地将“噪音”音乐化，提高噪音在音乐创作中的地位，使尔后的众多作曲家运用“噪音”、追求“新声”；他倡导音乐素材组合的自由化，他使“敲击乐器”和“管弦乐器”具有同等的地位，把锣鼓声看成和钢琴声一样重要，大大扩展了配器学的内容。他启发众多的作曲家追求新音响的兴致。

总之，上述音乐大师的创作与20世纪音乐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他们开拓、创造、大胆求变、刻意求新，给现代音乐以新的活力。20世纪的作曲家们的创作，极力摆脱传统大小调功能和声的束缚，“相继有了十二音列、系列音乐、机遇音乐、电子音乐、具象音乐、色泽音响……等多方面的尝试与探讨，反映了作曲家们求新求变

二十世纪的旋律

——读《现代音乐的焦点》

○许共城



的意念”。现代作曲家们对音乐创作的素材，不再拘泥于“乐音”，不再束缚于“调式特征”，他们大胆运用“噪音”，大胆突破乐器的“既有功能的范围，大胆创造新的音乐形式”。与此相关，也创造了衡量音乐美的新尺度，如果说，古典时期是以形式为美，浪漫时期是以抒情为美，那末，现代音乐则越来越兴致于以“音响”为美。可以说，多变、新颖，这是20世纪音乐的旋律特征。

《现代音乐的焦点》一书除正文外，前面冠以《导论》，后面以《传统与创新》为题作结语。《导论》阐述了20世纪音乐发展历程的概要。初期，以德奥地区为中心的后期浪漫派音乐和以巴黎为中心的印象派音乐，并称为当代音乐的两大主流，而通过史特拉汶斯基等大师的努力，创立了表现乐派，形成三足鼎立。20年代，荀贝格发表了《十二音列作曲法》，这一作曲法的沿用，使得音列的设计、音列的形式，以及音的交换与排列都成了音乐创作上的语法。40年代，法国作曲家梅西安完成一首钢琴练习曲，共启用了36个不同的音高、24种长度、12种演奏方式以及7种力度记号，并分别将它们纳入三种调式组合中排列而成，这是数学和理性在音乐中的高度结合，也是一个崭新的感性世界的展现，它标志着“系列音乐”的诞生。50年代和60年代，史托可豪森创立了“点描音乐”的语法，运用“组合形式”和“瞬息形式”进行创作，把“系列音乐”推向前。李给替则在60年代创立了“色泽音响与微分复音音乐作曲法”，他的音乐被称为“李给替风格”。70年代，拉亨曼给“噪音”和“乐音”以平等地位，给各种不同乐器以平等地位，视“作曲手法”为创作的决定性因素，创造独特的音乐语法，自成风格，引起了乐坛的注目。80年代，谁称雄乐坛呢？作者让我们拭目以待。

现代音乐的发展历史是创新的过程，也是融化传统和抗争传统的过程。作曲家创作的富有创新意义的乐曲，要能破传统而为人们所接受，常常需要一个过程。

一颗永不陨落的明星

——读魏巍《地球的红飘带》

新乐曲的首次出场往往造成“丑闻”，随后才逐渐被认可、欣赏、赞叹，最后有的才载誉乐坛。《导论》中举了两个很有意义的例子。在维也纳，荀贝格于1907年和1908年首演了第Ⅰ号、第Ⅱ号弦乐四重奏，结果听众哗然，被说成是创造了“历史性首演丑闻”。可是，三年后，他的巨作《悍妇之歌》的首演却获得巨大的成功。演出这部作品有近百名乐者参加。动用了朗诵者、五个独唱家、三个四声部的男声合唱团和一个八声部的混声合唱团等巨型编制，由史雷克指挥维也纳“音乐家管弦乐团”在维也纳音乐协会演出，它以澎湃的旋律、丰满的和声和浩荡的节奏，秉承后期浪漫派的余威，使听众震撼，引起了空前轰动，完全洗刷了三年前的“丑闻”。在巴黎，史特拉汶斯基发表了约五管编制的芭蕾舞曲——《春之祭礼》，当低音管序奏初起之时，引起观众的骚动，出现了疯狂的“喝倒采”，不得不靠大批警察来维持秩序以勉强完成首演。这次首演作曲家在观众眼里成了万恶不赦的江湖骗子。然而，一年后，重新由原指挥家蒙都指挥原班人马在巴黎的公演，却获得听众的赞扬和喝彩。这首芭蕾舞曲从此在管弦乐曲目中确立了卓绝不二的稳固地位，作曲家成为从印象乐派迈向现代乐派的划时代的音乐大师。大作曲家常要先受唾弃，而后才有成功的桂冠。这也许是音乐发展过程中传统与创新的矛盾给予杰出音乐家的“恩赐”。

《传统与创新》的副标题是：“由中国文字的独特结构导向现代音乐的创作。”作为《现代音乐的焦点》一书的结语，这是发人深思的。音乐和其他艺术一样，都面临着传统与创新的矛盾，如何保持传统的特色而又跟上时代的发展呢？作者思考着中国音乐的出路：20世纪新音乐的发展，“一方面，不但继承了传统音乐的遗产；另一方面，也开展了革命性的突破。至此，音乐的创作，不再拘泥于‘调性主宰’；它的结构，也可以不再束缚于‘固定形式’；甚至于，它的创作意念与美学观点，也引起了强烈而突破性的震撼。所以，现代作曲家，有了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可能，去实践它的‘创作理想’；同时，音乐演出的形态，除了传统音乐厅的表演方式外，更由于传播媒介的高度发展，使得音乐欣赏已经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品了，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欣赏。……面对着新时代潮流的巨浪，我们如何能因循着它，寻找出自己的‘路’，而不至被它所淹没；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在时代的‘共通性’中，保有自己传统的‘独特性’，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对这个头痛的问题如何解决呢？众所周知，匈牙利作曲家巴尔托克从民歌中吸取营养，从民族音乐中去寻创作的源泉；法国作曲家德彪西于万国博览会上受东方乐队演奏的启发，从异族音乐中寻找音乐的创作素材。许多作曲家效法巴尔托克和德彪西成功的先例，寻找新的创作源泉和创作素材，这是能给人以启示的。潘皇龙先生甚至认为：“我们还可以由古圣先哲的哲学思想中，寻找到音乐创作的灵感；甚至于，中国文字的独特结构，也给予我在音乐创作上颇多启示。”

（《现代音乐的焦点》，潘皇龙 著，全音乐谱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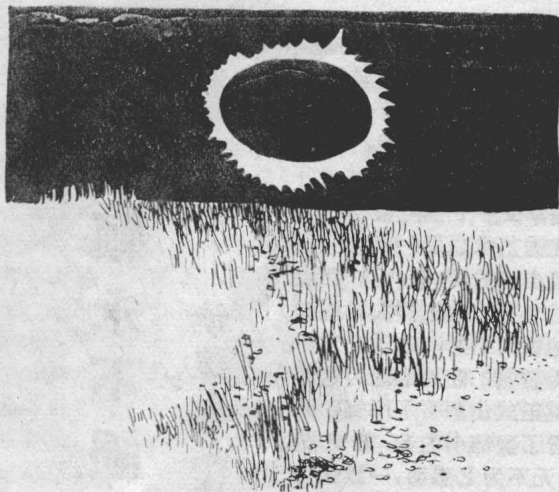
蔡畅大姐读了老作家魏巍的长篇新作《地球的红飘带》之后，立刻打电话给作者，说她要买一些，送给亲友，让大家和她一样，很好地享受一下描写长征的这部优秀艺术成果。去年夏天，在最炎热的季节，聂荣臻元帅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天给他读两小时，他听完之后甚为赞赏，还热心地为这部小说正式出版写了序言。凡是看了这部书的红军老战士，无不为之感动，一致认为仿佛又进行了一次长征，在有生之年看到她倍感亲切、欣慰。一些作家看了这部书也认为，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长征，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第一次，而且是成功的一次，她会成为传世之作；对文学艺术家来说，描写长征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却叫魏巍同志拿下来了。这

是中国作家队伍的光荣和骄傲。《地球的红飘带》也是倍受中青年读者喜爱的一部作品，他们看了以后感到：这本书真实记载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与骄傲，是献给我们中青年人的一课。我是最先看到这部作品的一个，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一个史学工作者，读后的感受同样是极深的。

读罢《地球的红飘带》全篇，给我的第一个强烈印象是，它从美学的角度，从本质上全面地再现了长征的立体形象，增强了人们对长征认识的立体感，也就是说，它完整地再现了我党我军以共产主义坚定信念为支撑点的长征的伟大雄姿。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以前人们写长征，大多是写长征中的一件事，一个侧面，一个片断，一个战役的作战经过，或者只是着重写爬雪山、过草地，如何艰苦，或路线斗争什么的。而魏巍同志突破原来的模式，把对长征的反映拓展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他从突过湘江写起，一直写到攻破腊子口，到达哈达铺。这中间，通过一百几十个人物、一系列重大事件，反映了长征的全貌和长征的最精彩的部分。既写了我军下层人物的活动，又写了我军上层人物的活动；既写了我军内部的路线斗争，又写了同国民党军的军事斗争；既写了我军的胜利，又写了我军的损失。其中对敌我双方统帅部、统帅人物的描写尤为突出。我方，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聂荣臻，以及林彪、张国焘、李德等；敌方，如蒋介石、杨森、王家烈、陈布雷、薛岳等。通过对这些不同性格、不同典型人物的刻画，从不同的角度，完整地再现了长征的壮观情景。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艺术与科学既不同而又相互关联；它们在审美的方面交会。”《地球的红飘带》给我的第二个强烈印象就是，它在文学与历史之间



恰到好处的找到了审美的交会点，使文学与历史达到了很好的结合，是文学与历史的结晶体。它既是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又是一部历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为它既有艺术的真实，又有历史的真实，它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使二者达到了科学的统一。作者坚持的是一条朴素而真实的原则，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是极深的。记得，在他动笔之前，他虽然已经掌握了丰富的史料，还是同我反复对证了四渡赤水以前敌军的兵力、番号及部署位置，成稿之后直到《当代》已经发表，他还在向我询问：“红军到达哈达铺以后的人数究竟是多少？”我拿到《当代》发表的文稿后，曾送给专门研究红军长征史的一位学者看，他看后感叹地说：“书中提到的一些重大事件、经过、人名、地名和敌军的情况等，作者比我们了解得还详细具体，我们还没有研究涉及到的问题，他在书中解决了。”

真实是文学创作的前提，真实是艺术的基础，真实更是纪实文学的灵魂。据我所知，作者一开始就把史料的真实性当成了作品的生命和灵魂。为此，他在探求史料的真实性上，为一般读者想象不到的。他为了写好长征，不仅早在三十年前就已有思想准备，中间虽然遇到“文化大革命”等情况，曾一度被冲断，但还是千方百计积累了大量有关长征敌我双方的历史资料，其中不少还是鲜为人知的内幕史料。不仅有档案馆深藏的档案资料、各种类型的回忆录和有关部门的研究成果，而且还有大量活的史料，即找当年当事人的采访笔记。这还不够，“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语）。他曾两次踏上长征经过的路线，亲身感受，沿途采访，从而获得了大量珍贵素材。因此，他书中写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有据可查，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都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它无论是叙事、写人，还是状物，都是非常真实的。他书中写的那些主要人物，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蒋介石等，都是读者所熟悉的，他们的特征、性格、风貌及内心世界，都如实地写出来了，都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都是那样栩栩如生。

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革命纪实性小说的生命线。目前，值得注意的是，在写这类作品（电影、小说、回忆录）时，有的竟然片面追求艺术效果，或生造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胡编一些既不附合人物性格、又不附合历史真实的细节，把作品弄得不伦不类，失去读者的信任。为了很好地解决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的统一问题，即找到艺术与科学的交会点，从而增强纪实性文学的生命力，我觉得魏巍创作《地球的红飘带》的经验，将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读罢全篇，它给我的第三个强烈印象是，在这部纪实性文学创作上，显示出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标志着魏巍的纪实性文学创作进入更加成熟的境地。

魏巍纪实性文学创作的风格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把民族传统小说的写法，散文、报告文学、特别是诗的写作笔调融会在纪实性小说的创作中。首先小说的名字《地球的红飘带》，就很富有诗意，“朴实中带有绚丽”，用飘飘扬扬的红飘带这种非常形象的比喻，来高度概括长征的风姿，长征的诗意，长征的精神和长征的伟大，令人神往无穷。各个章节的小标题也是很有诗味的，并带有画龙点睛之妙。随便举几个例子吧，如第13节，“革命的人们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作出了自己的抉择：毛泽东站上了领导岗位。当时也许并没有认识到，这是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又如第16节，“全军安危所系的浮桥，牵惹得周恩来寝食俱废；赤水河边，炮兵流下大把的眼泪，也不免使他心中酸楚。这都是一渡赤水发生的事”。再如第17节，“朱德被认为是军中慈父，因为他爱战士爱得那样深沉。朱德还有一本笔记，记载了许多人民的苦难，这些都激动过他的心灵”。至于行文中字里行间，富有绚丽多彩的那种散文诗式的语句更是比比皆是。例如，在过雪山草地一节中写到：“草地是神秘之国，死亡之国，是终日被雨雾荒烟笼罩的神秘地带，是为五彩缤纷的野花掩盖着的陷阱，是一个妖艳的女人，因为他有着极其诱人的美丽的外貌，可又不知不觉把人引向死亡……。”当然，在他的风格之中更多的是包含着诚挚、热情、质朴、真切，以及从中孕育的内心之美。他，人是这样的人，作品是这样的作品，《地球的红飘带》尤其是这样。这部纪实小说，“既有传统章回小说的引人之辞，又有《堂·吉珂德》式的结构”，也可说是出色的报告文学，或出色的长篇散文诗。

有人说《地球的红飘带》是写给老年人的。我认为，《地球的红飘带》不仅是献给老年人的礼物，也是献给青年人的礼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除作者本身是一个“战斗者”、写的是战斗的作品之外，那就是作者紧跟时代，在创作思想上注入了新的观念，更接近了青年人健康的兴趣点。即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写长征，让青年人在新的更高层次上来认识长征，来认识那个壮丽的时代。笔者希望有更多的青年读者，能充分认识这位老作家，并喜欢阅读他的新作《地球的红飘带》，因为这样会给你增加丰富的思想和情感，也会给你带来艺术的享受。

有人认为《地球的红飘带》开头和结尾写的还不够完整；因为受真人真事的局限，有的人物形象，写得还不够丰满；有的应该展开一些场面，而没有展开；对长征中有些人表现的消极因素，反映不够。我认为，这些不足之处，都是值得魏巍同志认真思考的。我们热切地期待着他的更为辉煌的巨著早日问世。

令人忧虑的辞书

——评近年出版的几部逆序词典

近年来,随着辞书事业的繁荣,辞书的品种不断地增多,这当然也包括一些逆序编排的工具书。据笔者所知,目前至少已出版了七部逆序现代汉语词典或词目,另外还有几部逆序古汉语词典即将出版或正在编纂中。虽然数量相当可观,但就已出版的几部词典来看,其中的质量方面却是令人忧虑的。

七部逆序词典或词目分别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的《现代汉语逆序词目》(杨升初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词林(正反序编排)》(蔡富有主编)和《动词逆序词典》(张立茂等编),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的《简明汉语逆序词典》(陈晨等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的《逆序现代汉语词典》(江天等编),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的《倒序现代汉语词典》(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编),以及新华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的《新法编排汉语词典》。后者已有人详加批评(参见《辞书研究》1986年5期《一本抄袭之作——评〈新法编排汉语词典〉》),这里不再赘评。《动词逆序词典》和《倒序现代汉语词典》笔者尚未见到,不便妄评。本文想着重就《现代汉语逆序词目》(以下简称《词目》)和《现代汉语词林》(以下简称《词林》)谈谈个人的看法,同时附带提及《简明汉语逆序词典》和《逆序现代汉语词典》存在的某些问题。

一、关于收词范围。

《词目》编者在说明中提到该书可以用于“研究汉语构词法、研究语义以及研究汉字使用频率”,“分析词义和练习组词”,可是所收的一些词语,却跟上述的这些用途无大干涉。编者一方面收入了许多没有实用意义的专门词语,如小说人物“李逵、武松”,历史人物“包公”和象“五·七干校”、“三老四严”这类不稳固的词语,以及一些非词的条目如“牛奶”,来体现编者的“创新”;另一方面许多必收的词语却不见收录,如“展览”、“合拢”、“低落”、“降落”、“活埋”等,更不用说《现代汉语词典》漏收的“破旧”、“网点”、“大驾”以及前些年出现的新词语。

《词林》的编者在前言中言明“一般不收集科技、哲社专业词汇和普通名词,以及地名、姓氏和专名”,因此《词目》中所出现的那些弊病,《词林》大多避免了。但是,普通名词词到底指的是些什么,编者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内涵,所以该书这方面词语的收录也显得颇为混乱,例如收了“花蕾”,不收“花子儿”;收了“司机”,不收“售票员”,使人无从知晓具体的标准是什么。另外,《光明日报》上曾经宣传《词林》“选词范围广泛,新词丰富,特别注意收入近年出现的新词汇、港台地区和海外中文出版物中的词汇”。笔者初步地翻了一下,虽不能说全无踪影,但觉

得里边“水分”甚多。编者特别声明“收录了一些新颖的或有文学意味的搭配词语”,但哪些词语才算新颖的或有文学意味的呢?翻遍全书也不甚了了。书中所收的不少是非封闭性的词语组合,例如“乃父”、“乃翁”、“乃兄”、“荒凉芜秽”等等,只是徒然增加篇幅,因为“乃父”之类收录了,“其父”等不录便没有理由;而“荒凉芜秽”,既然不是固定词组,那么收了“荒凉”、“芜秽”便够了,不必再列“荒凉芜秽”,原因在于这类的组合是无限的,不胜收录的。这个问题在《简明》一书中亦可发现,编者把“首屈”这样的自由词组作为词条收入,令人感到愕然。

客观地说,《词林》确实收了些新词,如“国格”“评估”、“抢手”、“黑马”等,但丰富则远谈不上,许多早已有之的新词《词林》中都查找不到,象“查处”、“一刀切”、“珍稀”、“展销”等都是。至于标榜收入港台地区的词汇,更是只得一二,譬如粤语地区十分常用的“炒鱿鱼”(解雇)、“水货”(冒牌货)等均不见收入,可见《词林》在这方面也缺乏特色。

二、关于词目编排。

在逆序词的排列上,各书采用的都是逆向音序排列法。但具体方法上则各有不同。《词目》按倒数第二个音节的音序排列,标音却是第一音节,因此看起来十分凌乱。甚至有些词也不按倒数第二音节来排序,例如:

jī 集

quán

yī

全集

一哄而集

照理说,“全”音quán,“而”音ér,“一哄而集”应在“全集”之前。

《词林》的编排体例较为合理。该书也按倒数第二音节的音序排列,但由于标注整个词目的拼音(字头标音以“一”代替),读者逆向检索时一目了然,不必自己先拼读好词目再依序查找,省却了许多不便。看来,作为不释义的逆序词目,如果再不标注整个词的读音,那么其实际效用便可想而知了。

不过,在轻声词的排列上,有一些问题值得提出。

《词目》列字头时轻声另列,譬如“子zi”与“子zi”分开列目,“子zi”列于去声之后。然而不少轻声音节都没有另列字头,如“爸爸”没有列字头“爸ba”;扁担的“担”也是轻声,不应该列于阴平“担”之下,而应另列轻声。一般的词典因为是顺序词典,词目首音节的声调即字头的声调,自然不会有轻声问题;而逆序词典字头的声调要依词目的末音节,毫无疑问,末音节是轻声时,字头的声调也只能标为轻声。否则,同形的轻声词与非轻声词便可能混合为一了,这种现象在此书中也时而可见,如非轻声的“用人”(使用人)与轻声

的“用人”(仆人)毫无区分,起不到区别词形的作用。

《词林》轻声不另列,而归入同形的非轻声字头,如“子zǐ”所属的逆序词辖于字头“子zǐ”之下。这种处理方法很值得商榷。许多轻声音节从语音到意义都与同形的非轻声音节有所不同,如“晓得”(xiǎo.de)中的“得”与“博得”(bó.de)中的“得”,实际上只是字形相同而已,把这两个不同的东西归附于同一词目,实在有悖于词目本身的含义。此外,由于编者采用了这种处理办法,所以对于拼写同形的轻声词和非轻声词的排列次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例如轻声词“游子”(yóu·zi)排在“游子”(yóuzi)之前,而“原子”(yuánzi)却排在轻声词“园子”(yuánzi)之前;又如轻声词“老实”(lǎo·shi)排在“老式”(lǎoshi)之前,而“视力”(shìlì)却排在轻声词“势力”(shì·lì)之前。令人不得要领。

三、关于标音问题。

工具书具有规范的作用,要求标音准确。可是《词目》和《词林》都程度不同地出现标音错误或前后矛盾。这方面的问题《词目》尤其严重。

先看《词目》。编者对专有名词标音时首字母是否大写显得游移不决,如“东欧”标Dōng,“华东”则标huá,类似的例子还有:“天主教、国际儿童节、米丘林学说”和“婆罗门教、春节、哈雷彗星、毛泽东思想”,前者采用大写,后者只用小写。即使是同样的词条,有时也没能够一致起来,如第232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标mǎ,而第254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却是标Mǎ。至于标错音的地方,也不在少数,如第469页“指甲心儿”标为zhǐ,应改为zhǐ;第152页“街谈巷议”、“街头巷尾”的字头误标为hàng,应是xiàng;第451页“剿袭”的“剿”也误作chāo,当改jiǎo。

《词林》标错读音之处略少一些。“凡例”说:“轻重两读的字,注音既标调号,又加前圆点”。可是“紫花”却标成zǐ·-,当从《现代汉语词典》标为zǐ·huā。“花花搭搭”标音是-·huā dā dā,其中第二个“花”只读轻声,应改为-·hua dā dā。第730页“学生装”误标为-shēng zhuāng,应改为-sheng zhuāng。前后矛盾的例子如339页“看法”作kàn·fa,158页则作kàn fa,当从前者所标。

这里顺便提一下《逆序》的注音问题。《逆序》只给字头注音,所有词条全无标音,这种处理方法实在令人不解。辞书应在形、音、义方面为读者解惑答疑,少注音一项,词典的效用必然减少许多,给使用者带来不便。这一问题在《新法编排汉语词典》中也同样存在。

四、关于校对问题。

校对不精,这是几部词典都存在的缺陷。虽然每本书出版之后都可能有一些校对上的差错,不必求全责备,但是象《词目》、《词林》《逆序》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只要稍加留心,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逆序》出版后附了一份勘误表,共列出七十几处错误,其中有的地方错得十分离奇,象“通常”错成“通长”,“茎”错成“基”。而实际上,错处还远不止这些,如296页“南货”条脱漏了“如”字,同一页又漏收词条“期货”。这些都不见于勘误表。

最后,想就几部逆序辞书的出版说几句题外的话。

你为该读什么书而烦恼吗

让我告诉你读书战略

确定目标

先想想过去看了什么书?做了什么事?反省检讨一下一整年来的得与失,然后决定今年需要“喂”自己些什么,是专业知识?是生活经验?是文学陶冶?是休闲娱乐?还是……?在千头万绪中理出自己的方向,确立今后的计划。

搜集敌情

进了书店是否像逛“大观园”?琳琅满架的书是否让你看傻了眼而不知从何“下手”,请信任自己的兴趣和直觉,多参考各种书目、书评、书介、书讯,要做明眼的爱书人,不要做“刘姥姥”!

分配预算

如果你不属于钞票塞满口袋的那种人,那你一定得有“自知之明”地分配你的购书预算。人生要做的事情太多,当然不只读书这一项,所以请拨拨算盘,告诉自己:今年我要花××元买书。

坚定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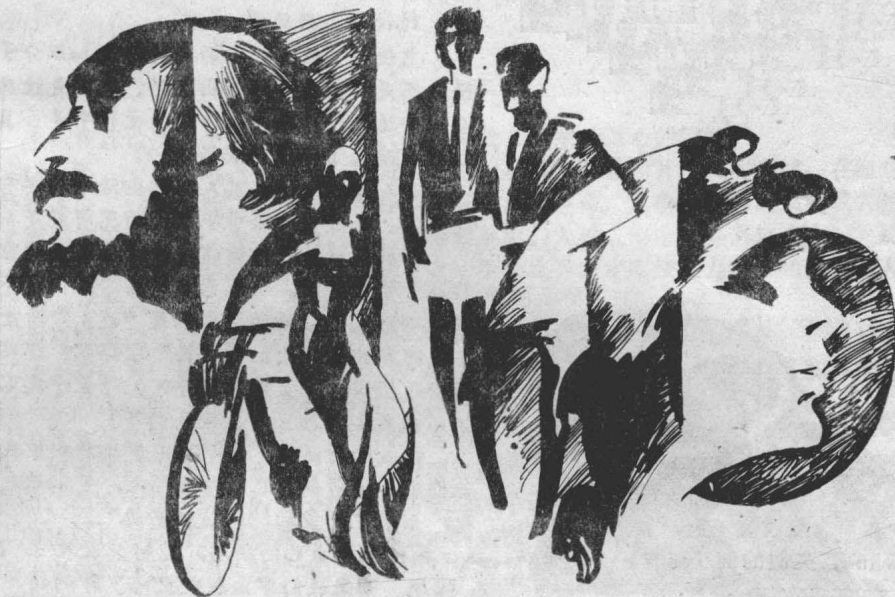
遇到诱惑,你要学习忍耐!忍耐!!如果你老是把打算买书的钱移做他用,去抽烟、喝酒、跳舞、打麻将、看MTV……你怎会有进步?

发起攻击

当一切都准备妥当,便立刻到附近的书店或邮局,至此便大功告成一半,另一半是把书读完。(摘自《皇冠》)

笔者诚恳地希望出版社之间协调辞书的出版计划,避免无谓的重复出版。象《词目》和《新法编排汉语词典》几乎是同时出版,前者印32万多册,后者印了近60万册,最近出版的《词林》、《简明》、《逆序》印数也各自超过2万册。然而相互之间却没有多大的实质差别,因而,是否有必要投入如此之多的人力、物力做这样的工作,值得怀疑。其实,这类问题并不仅见于逆序词典,诸如“《红楼梦》词典”、“唐诗鉴赏词典”、“新词新义词典”,都有一哄而上、群起而编之的现象。我国的辞书出版业目前尚有很多空白和欠缺,希望能将宝贵的精力和财力集中于那些更为急需出版的辞书。不知各家出版社和诸位读者认为然否?

离婚之后……



那是一个寒冷的星期六早晨，我们点起了取暖的炉子，互相凝视了一下，然后把孩子们都叫起来，举行了一个家庭会议。当时他们一个是20岁，一个19岁，还有一个是15岁。他们凝神听着，感到了紧张的气氛。房间里很静，我们努力用平和的语气告诉他们一件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事：我们决定离婚了。

劳瑞和包波呆住了，“不”，他们抗议着。年龄最小的克里斯哭着向楼梯跑去，他站在平台上喊道：“离婚是语言中最丑恶的字眼！”当时，我涌出一种可怕的幻觉，仿佛墙壁和屋顶正在塌下来，我们家庭所有的回忆、习惯、想象都在一阵阴冷的飓风中化为碎片。

我们夫妻俩中任何一个都会告诉你：我们从未有过象这样痛苦的时刻。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既不是谁有了什么丑事，也不是因为经常争吵——只是由于长期以来在我们中间默默滋长着一种隔膜和抑郁的气氛。所以，近两年来，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并寻求解决的办法。我们谁也没想到要离婚。但是，终于我们明白了，只有离婚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对孩子来说也是这样，当然，最好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没有痛苦。

在孩子们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失望的责难：母亲是不能离开家的！“我仍然是你们的母亲”，我许诺着，“我要尽我的责任，我爱你们——你们会看到这一点的。”他们呆呆地看着我，露出失落和遗弃的神情，然后走开了。房间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

我们是1950年结婚的，那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我们两个都是性情温和，拼命工作，并且各自接受了生活所赋予我们的角色，丈夫致力于工作，挣钱养家，并主宰着家中的大事，妻子顺从他的意志，照顾和培养孩子。

不久后我们就固定在自己的角色中了，而且关心的事情各不相同，有时就会发生冲突。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好时光。我们也交流着自己的感受，但从未涉及重要的问题。对待失败，我们一笑置之。当我们不痛快时，就听从来自各方面的劝告：努力奋斗，使自己快活起来。

1960年我们搬到了农村。我感到越来越孤独，我没有了汽车，没有了朋友，也没有了消遣。我丈夫的需求和我大相径庭，以至于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一无所得。孩子们不知不觉地长大了，我却无声无息地从家庭的意识中消退了。我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中，一方面我热爱家庭、家庭的礼仪、家务活和它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每一天我都感到越来越失望，我应该喊出自己的心声！

冒着失去原有角色的危险，我找到了表现自己的方

式。我开始写作。在我的笔下，所有别人无法窥见的我的欢乐与情感都滔滔不绝地倾泄出来。这是一种向自己的知音（尤其对家庭中的知音）诉说自己内心的方式，“看吧，我也在你们中间，我思考、感受、追求，我也是一个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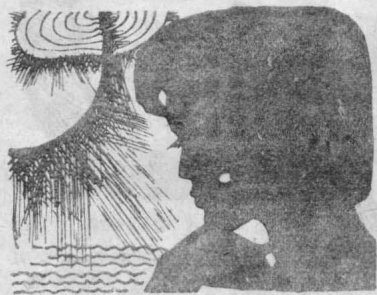
我发现我最广泛的听众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家庭之外。我希望在家中找到知音，但最后只是失望，我只好寻求职业上的安慰。渐渐地我痛苦地发现，我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我能够实现我自己。

在我单独生活的第一天，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是和我悲惨的想象恰好相反的事情。下午有了一段空闲的时间，我绕着自己的新住所转来转去，好象在研究我究竟在哪里。我很惊讶地看到到处都是一片静谧。母亲的餐具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孩子们的照片放在我随时可见的地方。一把摇椅安闲地躺在阳光下，一扇窗户敞开着，窗帘在风中轻柔地飘动。

在以后的几天里，一个微妙的意识在我头脑中扎下了根。（当然）我决非兴高彩烈地抛弃那些我失去的东西（写到这里，我仍然为它们而流泪）。但如果眼前这一切就是我付出高昂代价所换取的未来，那么理智告诉我这样做是值得的。

我时时想着孩子们。多年来，我一直准备着适应这个巨大的转变。孩子们象我们一样需要时间来悲痛、愤怒和接受现实。对慈爱的信心使我等待着他们的理解。

有一天，我听到他们上楼的声音。他们是结伴而来，显然这样可以提起他们的勇气。他们发现我很快乐，毫无戒心地欢迎他们，就急切地涌进了我的屋子，“真静啊！”劳瑞说。“这屋子里的一切都象你一样”，克里斯沉思着说，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我的心惊悸起来。包波拿起了我最喜欢的碗，专心地审视它，确认这就是我原来用的那个碗后，才小心地放下，微笑地直视着



好读书而不求甚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毛病。若是哪本书受到批判或者引起仁智间的争论，我便认真起来了，想看看谁是？谁非？剖析一番自己的观点是什么？能从中吸取些什么？

《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读的，开始读时，有点心浮气躁，觉得该书的题目太刺激，让人受不了。但对书中“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的说法却很欣赏。

电视剧《故土》中的安适之是知识分子的败类，但他毕竟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故土”培养出来的。我不免惶惑了。“既生白（白天民），何生安（安适之）？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是否真的存在有“滤过性病毒”？这一切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有人说，安适之其人实际生活中确实有，但只不过是“文人相轻”的显现罢了，并非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气质就是如此，我看也不尽然。

严凤英被整死的惨痛情景在屏幕上的重现，引起了观众的同情，多少人流下了伤心的泪。一代艺术精英给人们留下的是一片唏嘘和欲碎的心痛。难道这些杀人不见血的魔鬼不是“故土”所生？“文化大革命”，多少仁人志士被迫害致死，他们的“错”在那里？那些整人的人与其说出于无知，不如说出于阴谋。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没有逃脱悲惨的命运，这难道不是我们“故土”上发生的事？

在我们的社会，各个家庭直接将中华民族的优劣传授给他们的下一代，他们不善于解剖自己、学习别人，更不承认自己的缺陷。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形成了严重的“滤过性病毒”。

如何了解自己的缺陷，控制其发展和蔓延，是应该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拿出控制上海甲肝的精神来控制中华民族的“滤过性病毒”，治疗和预防同等重视，我想“滤过性病毒”就能控制，就会被消灭。

我的眼睛，仿佛宽慰地发现，我没有轻易地放弃我所珍爱的东西。在这一瞬间，我也明白了：他们三个已经停止了评断“离婚”，他们正在努力弄明白我和他们到底谁是正确的。我让他们每个人都紧靠着我。很长时间以来，他们第一次显得轻松和平和。

孩子们开始经常到我这儿来了。他们终于不再以“访问”的身份出现了，他们象到自己家一样来来往往，和我一起村庄里散步。还给我带来食品和用品。

离婚，意味着希望的破灭。最悲惨的离婚往往摧毁了所有的希望。但是，某些处理好的离婚，还会带来希望。

我和我丈夫也曾试图单独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谁也听不进另一个人的话。各种劝告也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能静下心来权衡利弊时，我们知道了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我们是不幸福的一对儿，可我们都是好人。我们曾有过共同的憧憬。现在我们仍然能在一起哀悼逝去的美梦。更难得的是，当我们讨论离婚的具体步骤时，我们还能彼此友好相待。我们一起拟出了离婚的协议，包括一些微不足道的方面：

我们的安排对双方都有效——尽管这些安排并不是正统的。

我们都支持对方仍然尽到父母的责任。我们尽父母责任的方式很不相同，但谁都不想改变。孩子们接受这一点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之间仍保持公开的联系，和孩子们之间也是这样。因此，离婚后，在我们的小圈子里，我和他还是不可避免地经常见面。我们尽量使对方在这种会面中感到舒服。我们还有各聚会——非正式的晚餐，节日的晚上到城里去参加一些特殊的活动等等。一开始，当然有点

尴尬。这些聚会对我们越来越有益处。

我们将孩子们的生活尽量安排得舒适。我们的孩子无论从年龄还是判断力上都足以自立了。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

我们大人将保持各自的生活方式。旧的生活习惯经常阻碍着我们分道扬镳。我提醒我自己，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而孩子们是我们共同的。

然而，当冬天到来时，我开始感到不安了，离婚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创伤。孩子们也不会象现在这样轻易地躲过它的伤害。

我觉得他们在独立之前，应该有更坚实的生活基础。现在，他们突然飞跃了，而且各自不同。我在等待着，但有些恐慌。他们在两个家中来来往往，倾诉他们的苦恼。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给他们的信仰带来了一道裂痕——美好的爱情，理想的父母，合家欢乐，等等。

我首先想到的是，应该做些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须要做的是倾听。当我们心神不定时，我们最需要的不也是让别人倾听自己吗？所以，正象我希望别人倾听我的诉说一样，我也倾听着，同时也思考着。

第一年过去了，我们的心都踏实下来。孩子们正在学校学会用长远的眼光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一天，他们跑到我这里，以恍然大悟的口气说：“你和爸爸对生活的追求真是太不一样了，我们真不明白，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凑合这么长的时间。”

后来，离婚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了，克瑞斯、劳瑞和包波都出去谋生了，如果他们跌倒了，就自己爬起来。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就共享喜悦，三个人都成长起来。

（摘自《古老的黑色幽默——现代夫妻之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面对难题和挑战

——介绍《生命伦理学》

○杨纯朴

生命和死亡是一个最古老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历来最关心的问题。

1841年，一艘名叫“布朗号”的美国轮船，从英国利物浦开往美国费城，在纽芬兰处触冰山。24小时后，船员和乘客分乘两只救生船逃命，其中一只因漏水和载人过多又面临沉没的危险。为了避免沉没，需要将其中14人投入海中，以减轻重量。那么，以什么标准来决定谁该活着谁该死去呢？用什么方法才能使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都觉得公平和人道呢？

在残酷的战争中，因医疗条件限制而不可能救活所有伤员时，该先抢救谁呢？

请不要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也不要认为是“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而是任何人在自己一生中都可能遇到的伦理学难题：

《民主与法制》1987年第8期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例：陕西汉中市一名59岁的女病人，因患“肝硬化腹水”，进入汉中市医院治疗。该病人入院后昏迷不醒，且时有惊叫，痛苦万分，病人的儿子和女儿请求医院采取措施，让她早点咽气，免受痛苦。院长坚决不同意。后经家属多次请求，两名医生为其注射“冬眠灵”后死亡。汉中市公安局以“故意杀人罪”将两名医生和该病人的儿子、女儿逮捕。此案在法学界引起争论。

《上海法苑》1987年第11期报道另一案例：鲁某因患左侧隐睾症而婚后无子，后夫妻两人通过“人工授精”术而怀孕。但鲁某怀疑不是亲子而要求离婚，后由法院做亲子鉴定方平息此风波。这场由一起离婚案引出的人工授精纠纷的新闻，在中国还是首次披露的，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和思考。

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物医学技术也不例外，它一方面带来积极的结果，使人们能更有效地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但另一方面也带来很多新问题，甚至是消极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来源于医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扩大；有的来源于医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有的来源于人们对死的权利的新的追求；这些都使医学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对传统的伦理观念提出了新挑战。比如：在对待死亡问题上的“安乐死”。这通常指那些患有不治之症，非常痛苦而又要求安适地迅速死去的病人，用药物或其他方式实现其愿望的一种临终处置。在客观上存在着安乐死的要求，但医务界的职业道德传统却严格反对医务人员行致死术。但是，面对一个诊断无误、治愈无望、又极度痛苦的垂死病人，到底是违反他本人的安乐死要求，使他处在痛苦的挣扎和重压之下，甚至不得不以跳楼等残酷方式来结束生命道德一些？还是以现代医药的成果，满足病人的意愿，使其安然无痛苦地逝去更道德一些？假如说生是人的权利，医生的职责在于以医药科学救死扶伤，保卫人的生的权利，那么现今的人们也提出死也是人的权利，人有权选择“体面的死亡方式”以求善终。因为死并不一定总是坏事，有时对某一个人来说，延长他的痛苦或空虚的生命要比死更糟；生也不一定是好事，如果生命的状态本身不好，审慎地终止他的生命反而是人们为他做的最好的事情。

避孕道德吗？人工流产道德吗？现代医学技术可以很安全地在妊娠的任何时刻将妊娠中止，也就是“微流产术”、“人工流产术”、“中期引产术”；也可以使一个过去无法活下去的不成熟胎儿在人工的特定环境中存活下去。这就产生了问题：什么时候胎儿便具有社会意义上的人权？有人权的生命开始于何时？精子的生命有受保障的权利吗？精子算不算生命？在什么时候终止一个胚胎的生命便是对一个有人权的个体的“谋杀”？从生物学意义上看，精子是有生命的，受精卵便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的开端；但从社会学上看，则很难认为精子和受精卵是独立的、有人权的生命。

在遗传和优生问题上也存在伦理学问题：有遗传性疾病的人是否有生育的权力？可否做出不准生育的决定？有遗传性疾病和有缺陷的新生儿是否有生的权利？有缺陷新生儿该不该治疗？能不能施用安乐死？以及这些对于人类和社会将带来什么结果？

溥仪画传的诞生

○薛书君

中意英合拍电影《末代皇帝》目前正风靡世界，获得九项奥斯卡金奖。对这样一部影片，看法的迥异，反映了东西方文化观念的不同，正如该片在美国放映时，一位评论家说，这是中国题材和好莱坞艺术的结合。这评论中肯与否，导演贝得鲁奇说得对，“我并不是想努力把这部影片拍成一部历史文献，历史的事件只是在想象的折光下，才使我感兴趣”。在七届人大会议期间，一位代表对影片中表现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溥仪的镜头，提出批评，认为不属实，并求证于金源所长。这一看法，也正是该片顾问《我的前半生》的执笔人李文达先生早已想到的。由此，才下决心一定要编一本有关溥仪的画传，用历史照片来记录溥仪这个人，要真实地再现人——龙——人的历史。画传要把溥仪从叛国者到爱国者的真实历程表现出来，把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伟大工程再现出来。

由于条件的限制，时间的紧迫，李文达先生放下了手中正为北京出版社写作的长篇小说《人神沧桑》，日以继夜地投入了画传的主编工作。就在他的助手们四出搜集历史资料的同时，一部三万字的画传说明文字，在李先生的笔下写成了。“这文字真好”，看过的人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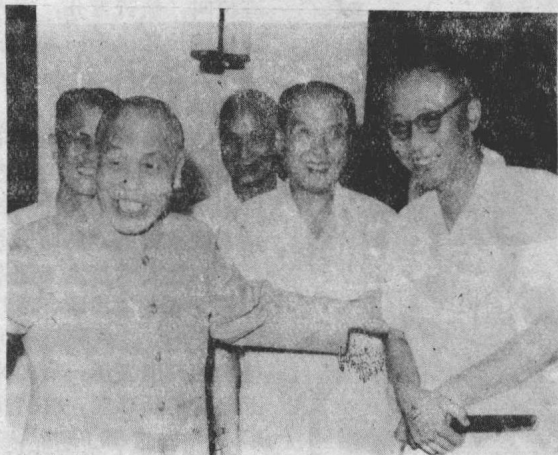
（是的，因为李先生太熟悉溥仪了，而溥仪也太信赖李先生了。）画传照片的搜集，靠着李先生与溥仪亲属——溥杰、溥任、溥仪、毓琦等先生及溥仪的三妹五妹等真挚的友情，靠着李先生在研究溥仪的学术活动中的威望。同时，抚顺战犯管理所、紫禁城出版社、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新闻图片社、新华社等单位和个人也纷纷提供资料，再加上群众出版社资料室为李文达写《我的前半生》时搜集的大量清末民初的资料。在占有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筛选，才从两千余幅照片中，选出

了380余张，配上精彩的说明文字，形成了这本珍贵的历史画册。画传从家世、童年、复辟、大婚、出宫、在天津、满洲事变、第三次登极至崩溃、在苏联、回国、作证、新生等方面完整地记录了溥仪的一生，而整个编辑时间从去年5月15日至7月底，仅用了75天。

为什么这样赶着要出这本画传？用李文达先生的话说，就是要用画传弥补《末代皇帝》电影中的不足。溥仪先生所以能是今天的溥仪，不是靠着他“天子”的特殊地位，不是靠着他传奇的生涯，没有中国共产党人人道主义地对待他、帮助他、教育他，从而促进了他内心世界的变化，就不会有今天中国和外国都感兴趣的溥仪。当溥仪真正从内心生长了勇气，感到要直起腰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着的中国人时，他才完成了自身历史的塑造，这是任何人不可代替的，也是歪曲不了的。这就是李文达先生不顾七十高龄，挥汗赶编这本画传的目的。

这本画传为了达到补充电影不足的目的，第一版已在香港出版，并向海外发行，第二版近日也将在国内成书。

（《人龙人——溥仪画传》，群众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香港港龙图书公司出版）



李宗仁接见溥仪（1965年）

在器官移植问题上也如此：器官移植是当代医学的重大进展，它使过去必定死去的某些患者可以延长数年以致数十年的生命。但由于这一治疗中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就是需要从另一个人身上取得能够存活的器官，因此存在着更多的伦理学和社会学问题：摘取遗体上的器官是否道德？为了提高移植后的成活率，要求“供体”的器官越新鲜越好，有时“供者”一息尚存，而“受者”又危在旦夕，如及时移植，可以一生一亡，如失去时机，则二人俱亡。这时摘取尚有一息者的器官是否道德？

关于生与死、个体与社会、父母与子女、自体与异体、性与婚姻、家庭与社会等等，许多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看法，凝结于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等之中，成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大的稳定性、继承性和保守性。这些观念的发展和变化要比科学技术的发展缓慢得多，因而出现观念的冲突。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冲突和矛盾，无论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社会观念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面对这些“悲剧的选择”，我们该如何做出决定呢？生命伦理学就是为了解决这类难题和回答这些挑战应运而生的。它帮助人们决定在影响出生、死亡、人性、生命质量等生物医学领域中如何行动，它已成为医学界、哲学界、生物学界、社会学界、宗教界、新闻界、立法者、决策者和公众共同关心的超学科问题，成为涉及人类生命的政策和决策的理论基础。

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我国更鲜为人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邱仁宗同志，多年从事医学哲学方面的研究，是我国医学界哲学问题的权威，他的《生命伦理学》一书，填补了我国伦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并不熟悉，但会产生浓厚兴趣的新知识和新信息，介绍了许多使人深受启发的新思想和新材料。

（《生命伦理学》，邱仁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学科丛书”，定价2.30元）